

布赖恩·马吉 著
郭昌辉 郭超 译
昆仑出版社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POPPER Brian Magee

波 普 尔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Brian Magee
POPPER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布赖恩·马吉 著
郭昌辉 郭超 译

波 普 尔

昆 仑 出 版 社

图字:军-1998-037号

原文书名: Popper
原文作者名: Brian Magee

Popper: 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85 by Brian Mage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普尔/ (英) 马吉 (Magee, B.) 著; 郭昌晖、郭超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3-X

I. 波… II. ①马…②郭…③郭… III. 波普尔, K. (1902~1994) —传记 IV. K561.59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71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5.50元 (膜)

作者简介

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193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少年时代就读于伦敦的基督慈善学校,后服兵役被派往国外。退役后又先后就读于基布尔学院和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他获得现代历史以及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两个专业的优秀荣誉学位并任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主席。在瑞典执教一年后他又被耶鲁大学授予哲学研究员职位。1956年他结束了大学任教生涯,成了一名作家、评论家和广播评论员。此后直到1972年他一直从事这一领域的活动,只是在1970年他曾再次进入大学学术界,在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担任哲学讲师一年。1973年他应邀担任剑桥大学万灵学院的客座研究员,1974年至1976年他任《泰晤士报》固定专栏作家。由于在广播评论方面成就卓著,1979年他被授予英国皇家电视协会的银质奖。1974年至1983年他是莱顿的一名下院议员,最初是工党的下院议员,后来又转成社会民主党的下院议员。由于他是一位公认的音乐和戏剧评论家,1983年至1984年他被推举担任评论家协会主席。1984年至1994年期间他在伦敦大学的金斯学院担任思想史的名誉高级研究员。从1994年至今,他一直是伦敦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有17本书被译成各种语言,其中包括《新激进主义》(1962),《民主革命》(1964),《瓦格纳》(1968),《现代英国哲学》(1971),《面对死亡》(1977),《思想家》(1978),《叔本华的哲学思想》(1983),《大哲学家》(1987),《论盲目》(1997)和《一位哲学家的忏悔》(1997)。

引 言

不管怎么说,卡尔·波普尔这一名字在知识界还不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一情况需要先说明一下。因为正如 I·伯林在他所著的卡尔·马克思传记(1963年第3版)中指出的,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是“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历史观的最彻底和最犀利的批判”;如果这一判断还算正确的话,那么波普尔——在一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统治的世界里——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不仅如此,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当属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爵士于1972年7月28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套节目中说:“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盖世无双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还有许多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承认波普尔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 J·莫诺和约翰·艾克尔斯爵士。后者在他所著的《面对现实》(1970年)一书中指出:“……我的科学生涯多亏于1945年我的信仰的转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从那时起我转而信仰波普尔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说。……在系统阐述和深入研究神经生物学中的重大问题时,我一直努力遵循波普尔的哲学思想。”艾克尔斯谆谆告诫其他科学家“要认真研究、深入探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使之成

为指导自己科学生活的基本准则”。持有这种看法的不只限于实验科学家，著名的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赫尔曼·邦迪爵士曾精辟地指出：“科学舍此别无他法，此法的全部精髓尽在波普尔的阐述中”。波普尔对人们思维的影响上及政府官员，下达艺术史学者，其影响面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是任何一位操英语的哲学家都望尘莫及的。厄恩斯特·冈布里奇爵士在《艺术与幻觉》一书（此书被K·克拉克称为“我读过的论文艺批评的最精彩的著作之一”）的序言中写道：“若此书通篇让人感受到波普尔教授的影响存在的话，本人则荣幸之至”。英国两大政党中的进步内阁成员如A·克罗斯兰和爱德华·博伊尔爵士在政治活动中所采取的观点一直深受波普尔思想的影响。

以上这些事例除了说明波普尔的学说极为广泛的适用范围之外，还清楚地传达了一些重要信息。它们向人们表明，与当代众多的哲学家的学说不同，波普尔的学说对受其影响者具有显著的实践效果：它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而且全方位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一言以蔽之，它是一门实践的哲学，而且对各个领域中的众多出类拔萃者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因此，谁也不会说波普尔被人们忽视了。不过，这一情况反而更让人们惊讶不已——为什么波普尔的名气不大，而许多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家却名声显赫？究其原因，一是机遇问题，一是人们无意中曲解了他的学说，再就是他的方法中也存在着使没有研究过此方法的人容易误解的一面。

卡尔·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他青少年时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转而成了一名满腔热情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之余，他不仅投身于左翼

政治活动，参加由阿德勒领导的儿童慈善社会公益活动，还加入由舍恩伯格创立的民间音乐会社。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波普尔的青少年时期是一段令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时光。学生时代以后，他以教书谋生，在中等学校里教授数学和物理。但他仍继续专心致力于社会福利工作，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和音乐活动——当然哲学仍是他倾心关注的领域，而且从此以后，他发现他往往与当时风靡一时的哲学派别，即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意见相左。维也纳小组成员O·诺伊拉特给波普尔起了个“官方反对派”的绰号，使他成了一个与维也纳小组格格不入的人。他发现他早期的著作无法原封不动地出版，他的处女作至今尚未出版。他出版的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研究的逻辑》（1934年秋季出版，但书中注明的出版年份是1935年）是经过大刀阔斧删减后的版本，内容仅是原书的二分之一，书中收录了现在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

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在表面白热化的政治领域斗争背后，左翼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正四分五裂、日渐衰落。后来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164至165页）一书中描绘激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特征时写道：“既然革命一定会来临，法西斯主义只能是引发革命的方式之一。由于革命能量蓄积已久，革命早已成熟，情况就更是如此。俄国尽管经济落后，革命却早已开始。先进国家里只是那些由民主主义煽起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在阻碍着革命的前进。因此，通过法西斯主义来摧毁民主主义，促使工人大众对民主主义方法的最后醒悟，才能推动革命。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感到他们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精髓’及其‘真正的历史作用’，法西斯主义从本质

上说是资产阶级的最后挣扎。因此，当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共产主义者并不与之斗争（谁也不指望社会民主主义者加入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因为他们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时机早已成熟，法西斯主义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小段插曲，延续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它必然会加速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共产主义者无须采取行动，共产主义并不对他人构成伤害，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所面临的‘共产主义的危险’从来就是子虚乌有之谈。”

这段论述背后的历史现实充满了围绕政治策略和道德规范的痛苦的争论。这场争论将波普尔裹挟其中，也成了日后他许多政治著作的思想源泉。他终于精确而又不无沮丧地预见到奥地利将被纳粹德国吞并，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政治大战，他的祖国将在这场战争中与法西斯同流合污。因此，他决定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离开祖国（这一决定使他幸免于难，因为尽管少年时代的他是一名新教徒，他父母也均受过洗礼，希特勒还是会把他划归犹太人）。1937年至1945年期间，他在新西兰大学讲授哲学。实际上，一开始他在自学希腊语，以便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众多希腊哲人，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后来，他用英语撰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正如I·伯林在我们前面所援引的文章的评论中说，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独创性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著作。”波普尔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战争著作，因为他是在听到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的消息——长期以来他一直担忧害怕的一条消息——的那天才最后决定动手撰写的。希特勒的入侵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在1943年（当时他这本书还未完稿）仍扑朔迷离、变幻莫测，使他在这场捍卫自由、抨击独裁的战斗中处处闪烁的激情日趋强烈，他还试图在书

中说明这一激情的发展过程及其强烈的感召力。1945年这本书得以出版,共两卷,它为波普尔在操英语的世界里第一次赢得了真正的声誉。

1946年波普尔迁居英国,一直居住至今。初抵英国时,他发现英国哲学界如果还有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流派的话,那就是他在战前维也纳时早已摒弃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由1936年1月出版的A·J·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介绍到英国的。波普尔本人的著作《研究的逻辑》当时还没有译成英语,所以实际上还鲜为人知。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听说过这本书,它的内容常常被人误解。1959年秋,在此书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它才被译成英语出版,题目被冠以《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波普尔为这本英语版特地增加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否认自己与(在此以前)刚冒出的时髦的语言哲学有联系。但是语言哲学的主要杂志《精神》却在对波普尔学说根本不理解的情况下对此书妄加评论,而且从不提及这篇序言。中年的波普尔再次发现他也难以融入英国的哲学界,就象他年轻时在奥地利与维也纳小组格格不入一样。然而,他早就赢得的这一孤芳独处的国际声誉继续与日俱增,终于在英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65年他被授以爵士)。即使如此,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仍不愿聘他为教授。然而,他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教授,讲授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课程,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二十三年的大学执教生涯。

正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日子里,波普尔出版了他的另外两部著作,均是他的论文集,其中大部分论文均发表过。在《历史决定论的贫乏》一书于1957年问世之际,A·凯斯特勒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载文说,这可能是“今年出版的惟一能对

下一世纪产生影响的一本书”(书中的文章均被《精神》杂志拒绝采用而退回)。此书可看作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姊妹篇。同样,1963年出版的《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可以认为是《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的姊妹篇。1969年波普尔退休后,又于1972年出版了《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一书,该书是他的另一本论文集。今后可能还有一些书要问世,因为一些未出版的文章已完稿尚未付梓。他一生极不愿意让他的著作出版,因为在他看来,文章总有修改完善的余地,也总会有时间允许他这样做。

在波普尔哲学生涯初期,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波普尔关注的问题基本上与他们关注的问题类同。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种臆断来阐释波普尔的思想。语言哲学家也如出一辙。这两派都真诚地相信并断言:波普尔的学说远不像他本人一再强调的那样与他们的思想大相径庭。因此,波普尔坚持与他们划清界线,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感到厌恶。我会在适当时候一一剖析他们对波普尔哲学思想的重要误解。这里我只想指出,波普尔的著作本身有一个特点,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也是无法避免的,岂料它竟成了横卧在作者与未来可能的读者之间的一个障碍——正是由于他们是未来可能的读者,他们才无法理解这一特点。波普尔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意义我们以后将给予充分阐明),知识只有经过批评才能有所发展。他自己大部分重要思想正是在批评别人思想的过程中提出的,例如,《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大部分论点都是他在批判柏拉图和马克思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批批的学者翻阅他的书,关注的是他对别人的批判内容,却不去完整地通读全书。这本书

甚至普遍地被认为是一部批判柏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结果使许多对此书有所闻而并未阅读的人对它产生了误解。甚至有人认为，既然此书批判了马克思，它就是一本带有右翼倾向的书。这本书所引起的学术争论没有围绕着波普尔的建设性论点展开，却在波普尔对其他哲学家评价的可信度上纠缠不休。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如 R·B·莱文森的《捍卫柏拉图》和 M·康福思的《开放哲学和开放社会》。无谓的争论充斥学术杂志，千篇一律地喋喋不休于波普尔的译文是否忠实柏拉图的希腊语原意，波普尔书中同时具有的捍卫民主的思想却丝毫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然而，即使可以证明波普尔对柏拉图和马克思的批判有误，书中对提倡民主观点的论述仍然鞭辟入里、掷地有声。任何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严肃而理智地批评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它的论点，而不是评估作者的学识——尽管我稍后将会证实波普尔在书中所表现出的渊深学识，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折服的。

与此有关的是波普尔和他的未来可能的读者之间存在的另一个小小的障碍。波普尔认为，哲学是人类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把许多事情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而许多这样的假定都具有一种哲学特征。我们在个人生活、政治活动、日常工作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根据这些假定行事——尽管有些假定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是更多的假定很可能是错误的，有些甚至是有害的。因此，批判性地审度我们预先作出的各种假定——这是一项哲学活动——不仅在理智方面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观点认为，哲学是活生生的、维系所有人的一项不可小视的活动，而不是一项毫无实

际意义的纯理论活动，不是局限于少数人的一项专业。毋庸置疑，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专业哲学家的著作。然而，波普尔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各种理论的批判性的审度，因此书中充满了对各种“主义”的大量探讨，涉及到历史上许多思想家，这一情况是不可否认的。当他仍处于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下用英语撰写他的第一批著作时，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哲学家中能如此下功夫使自己的文章清晰易懂的实为罕见。波普尔的文章清晰明了，以致于很容易掩盖其思想深度。有的读者误以为他的论述实在简单不过，甚至有点平淡无奇、缺乏想象力。他们没有品味出其中令人震撼的精神启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振奋感。他的文章本身就显得典雅脱俗、宽宏大量、富有人情味；理性的分析和情感的迸发如水乳交融、随处可见。其文风与马克思的文风极为相似——说理的背后都让人感受到同样强大的驱动力；同样横扫千军的磅礴气势；同样尖刻辛辣的感染力和同样的大度和自信。然而，在逻辑的严密性上波普尔要更胜一筹。他的文章有一股把握读者的力量，只要你熟悉了他的术语，阅读他的文章就会使你精神为之振奋。最重要的是，他引用的论据殷实详尽——这不失为波普尔著作的一大显著特点。

波普尔的哲学是这一学科中最具有传统思想的一门自成体系的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里被人们以不同的语言介绍在各种杂志刊物上。但是，只有最勤勉刻苦和不囿于一门之见的学者才有可能阅读过他的全部浩繁的讲稿和出版物，更不用说让人们理解这些延伸至全部人类经验的独特的说明性框架中的相互关联的部分了。在此仅举一个例子：波普尔在物理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是一个非决定论者，

他认为,要科学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一论点是他在《英国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这一论点朝一个方向发展,形成了他捍卫政治自由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朝另一方向发展,引导他开始致力于或然性理论的研究。或然性理论在量子物理中的应用为物质论中的某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物质论一方面导致了爱因斯坦、德布罗格利和施罗德格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引发了海森伯格、希尔斯、博尔和 M·博恩之间的严重分歧。只有极少数具备必需科技素质的专职学者才有可能弄清这些关系,搞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在本书中,我想对波普尔的十分庞杂而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一大胆而清晰的概述,这需要我们先从知识论和科学哲学的领域入手,这样做的理由以后会不难理解。我提醒那些自以为对这些领域不感兴趣、只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兴趣才阅读此书的读者不要略过这些章节,因为波普尔曾经把原本从自然科学中抽象出的思想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对自然科学的了解是进一步理解社会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且,我将努力证明这两者构成了包括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在内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同时,我还希望能说明为什么这一哲学体系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为什么从广义上看它同当代的其他哲学体系总是显得那么不和谐——不过,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不可能深入地探讨具体的争论,要想探讨物理学、或然论或逻辑学中更专业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不打算在本书中论述这些领域中被波普尔运用于证实其基本论点的具体细节,我感兴趣的仅仅是波普尔的基本论点。

引 言	(2)
第 一 章 科学方法—— 传统观点和波普尔的观点	(1)
第 二 章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19)
第 三 章 波普尔的进化论和世界 3 的理论	(40)
第 四 章 客观知识	(50)
第 五 章 开放社会	(60)
第 六 章 开放社会的敌人	(74)
后 记	(97)
书目提要	(100)

第一章

科学方法——

传统观点和波普尔的观点

“法则”(“law”)一词往往含糊不清,易引起歧义。只要你说“破除”了一项自然法则或一项科学法则就混淆了这一词的两种主要用法。社会法则给我们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当然能破除——事实上,如果不能破除的话,也就无需去制定它了。比如,社会不会去立法禁止一个人同时身处异地。另一方面,自然法则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它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比如,水在 100°C 时沸腾。

这句话本身只不过陈述了什么事情——假定具备了某些基本条件，例如一定量的水被加热——发生了。不管这句话是对是错，反正不能被“破除”，因为它不是一条命令，水并非接受了命令才在 100°C 时沸腾。近代科学出现前，人们认为水是接受了（来自神的）命令而在 100°C 时沸腾的，这就是不幸引起歧义的原因，因为自然法则在这里被认为是众神的命令。其实，自然法则并非任何规定需要去“遵守”、“服从”或“打破”，而是对以事实为基础的某一普遍特点所作的说明性的陈述。因而一旦发现有误，就应该修正或摒弃，如今谁也不会对此提出质疑了。

探索自然法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科学的主要任务，至少从牛顿时代以来就是如此。但是，首次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系统描述的却是 F·培根。尽管从培根时代以来，他的描述经过全面修正、补充和完善而更趋复杂深奥，但是他首先倡导的传统方法的精髓几乎被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所有具备科学思想的人所接受。这一精髓的中心思想如下：科学家首先从科学实验开始，实验目的是在人类已知和未知的科学前沿地带中选取某一点进行精心控制和严格调节的观察，然后将实验中的发现系统地记录下来，可能的话还将它们公布于众。经过一定的时间后，他和同领域里的其他科研同行共同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如此不断发展，普遍特点开始出现，科学家们各自开始提出自己的假设——即具有类似法则特点的陈述，它不仅与所有已知的事实相符，还能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家们各自收集证据，证实各自的假设。如果某一科学家的假设被成功证实，他就发现了一条新的、能揭示更多自然奥秘的科学法则。至此，科学领域中的这一新缝隙

就被科学家弥合了——也就是说，只要在我们认为新发现能提供新信息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应用它。就这样，现有的科学知识存量得到了补充，人类科学未知的前沿地带变成了后方。整个这一过程将从科学的前沿地带又重新开始。

在对具体事物作持续不断观察的基础上概括出一般性陈述，这种方法叫归纳，并被视为科学的标志。换言之，是否使用这种方法被看成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由于科学陈述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证据上——简而言之，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它与所有其他建立在权威、情感、传统、猜测、偏见、习惯和其他基础上的陈述就截然不同，惟有它才提供了确实可靠的知识。科学是此类知识的大全，科学的增长就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可靠的知识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休谟对此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他指出，由个别观察得出的具体陈述，不论如何包罗万象，从逻辑上说也不可能概括出不受限制的普遍陈述。如果我在一个场合观察到事件 B 伴随着事件 A 出现，但从逻辑的角度看并不见得在任何其他场合事件 B 也伴随着事件 A 出现。即使两次观察结果相同，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甚至二十次乃至二千次这样的观察都不能概括出这样的结论。休谟说，如果这种现象经常出现，我就会预料下一次事件 B 也会伴随着事件 A 出现。但这只是心理学范畴里的概括，而不属逻辑学范畴里的问题。太阳每过去一天就会再次升起，这是妇孺皆知的，但这并不能保证太阳明天将升起。如果有人说：“你说的不错，但是我们可以运用已知的物理法则预测出明天日出的精确时间，就象我们现在将这些法则运用于各种情况中一样”，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作出